

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 青瓷分期再研究 ——以与越窑青瓷发展对比为中心

郑建明

内容提要 纵观耀州窑的整个发展历程，其在五代时期质量有巨大提升，而这一突变式发展，受益于当时青瓷之冠——越窑青瓷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耀州窑青瓷从器形、装饰、题材、装烧、窑具等一系列方面均受到越窑的深度影响，其最具特色的雕、刻花装饰，明显具有越窑的影子。从越窑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在五代时期以素面为主，流行花口与瓜棱腹，出现浅浮雕装饰；北宋早期流行细线划花工艺，浅浮雕比例增加，近中期开始出现粗刻花；北宋中期流行粗刻花，轮廓内填以篦划纹；北宋晚期则主要是仅有轮廓的粗刻花。而耀州窑青瓷的装饰发展历程几乎与越窑相一致，仅略滞后。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耀州雕刻花以及粗刻花技法不可能在五代及北宋早期前段流行。

关键词 耀州窑 越窑 分期研究

一 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的发展序列

笔者在《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分期研究——以纪年材料为中心》一文中^{〔1〕}，以纪年材料为中心，结合目前已发表的非纪年墓葬、窖藏以及塔基等遗迹单位，将五代北宋时期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划分成五个时期。从装饰特征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五代时期以素面为主，流行花口与瓜棱腹装饰，基本不见其他装饰纹样〔图一〕。

北宋早期前段耀州窑青瓷装饰特征与五代时期基本相同，出现粗刻莲瓣纹〔图二〕。

北宋早期后段，除了花口与瓜棱腹做法外，装饰纹样开始较多地出现，有细线划花、粗刻花、雕刻花与小堆贴，题材主要是缠枝花卉与莲瓣纹。作为精品的雕刻花类器物最早出现于叶茂台M7与关山M7两墓罐上，均为莲瓣纹〔图三〕，其上承北宋早期前段更为简单的刻花莲瓣纹，下启1000年后繁缛雕刻花。

〔1〕 郑建明《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分期再研究——以纪年材料为中心》，《东南文化》2022年第6期，第100—114页。

北宋中期和晚期，耀州窑产品特征较为接近，流行纹样装饰，以印花与刻花为主，雕刻花基本不见，题材以缠枝团菊为主，纹饰繁缛〔图四〕；至北宋晚期，较多出现仅刻花、叶轮廓而不填经络的现象，风格粗疏草率。

通过以上的梳理，建立了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的全新发展过程，改变了原来认为耀州窑雕刻花青瓷出现于五代的看法。该类器物当出现在980年前后，并于1000年前后达到了鼎盛。进入北宋中期以后，这一装饰手法被刻花与印花工艺所取代。

以上关于耀州窑青瓷发展序列的分析，是以已有的纪年材料为中心、结合年代相对明确墓葬材料建立的。同时，耀州窑的发展与越窑有紧密关联。

纵观其整个发展历程，唐代的耀州窑产品一般，其质量的巨大提升是在五代时期，而这一跃进“与装烧工艺的革新关系密切，装烧工艺的突变式发展，则受益于当时青瓷之冠——越窑青瓷技术的引进推广。由于黄堡地区原料宜青瓷不宜白瓷，确定发展青瓷的黄堡窑自然将越窑作为主要学习目标。装烧工艺是青瓷技术的重要内容，五代黄堡窑窑具造型和垫隔、装烧的许多细节步骤都有越窑技术的印迹”^{〔1〕}。越窑装烧工艺的核心部分是M形匣钵和泥点垫烧。唐代的耀州窑主要使用筒型与漏斗型匣钵，这是邢窑、定窑等北方窑业的传统。到了五代、北宋时期，被数量众多的各式M形匣钵所取代，耀州窑青瓷的质量也是在同一时期迎来爆发，说明黄堡窑场其技术来源主要是南方的越窑，在器形、装饰题材、装烧、窑具等诸多方面受到越窑的深度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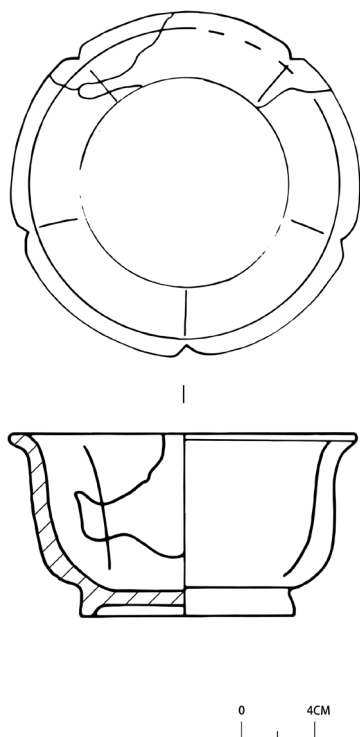
耀州窑最具特色的雕、刻花装饰，也明显具有越窑的影子，许多学者认为，耀州窑深剔刻技法显然是受越窑影响，尤其是碗类外壁的莲瓣纹，无论构图还是刀法都与越窑非常相似”^{〔2〕}。

因此本文拟以越窑的发展序列为中心，探索耀州窑的发展，

〔1〕 王小蒙《黄堡窑装烧工艺的发展演变——兼谈黄堡窑与越窑、汝窑及高丽青瓷的关系》，载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346—355页。

〔2〕 穆青《河北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兼谈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与白瓷上的深剔刻装饰》，载前揭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第309—3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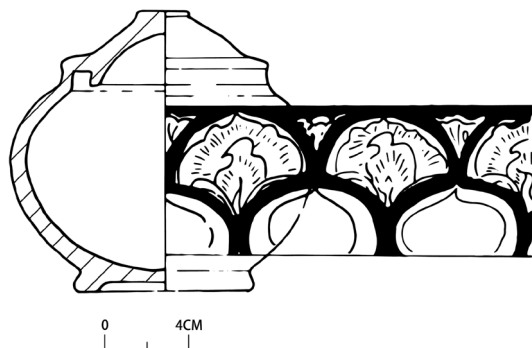
〔图一〕冯晖墓出土温碗



〔图二〕静志寺出土碗



〔图三〕叶茂台辽墓出土盖罐



并验证以纪年墓为中心建立的耀州窑青瓷发展序列的合理性。

二 以纪年墓为中心的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发展序列

（一）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基本特征

五代时期出土越窑青瓷的纪年墓葬，以吴越国的钱氏家族墓为核心，包括少量的辽代贵族、五代贵族墓等，主要有钱元玩墓^①、钱元瓘墓^②、康陵^③、吴汉月墓^④以及临安青柯童府君墓^⑤、宁波袁从章墓^⑥和辽高继蟾墓^⑦、赵德钧墓^⑧。其中康陵出土越窑瓷器数量最多，而钱元瓘墓质量最高。另外杭州三台山墓^⑨、临安板桥墓^⑩、太庙山墓^⑪、苏州七子山墓^⑫等因墓葬破坏严重，墓志不存，从墓葬结构及规模来看，也应该是五代钱氏家族墓。

五代纪年墓出土越窑青瓷器特征如[表一]。

[表一] 五代纪年墓出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

编号	墓葬	年代	出土器物	装饰特征
1	后梁高继蟾墓	909	花口碗、宽沿盆各1件	素面，碗作花口，瓜棱腹。宽沿盆秘色瓷
2	吴越国钱元玩墓	922	四系缸1件，其余不详	素面
3	五代吴越国童府君墓	926	花口碗1、碗1、盂1、盒1件	素面，花口碗作瓜棱腹
4	五代吴越国康陵	940	瓜棱罐10、圈足盘9、套盒9、花口碗3、盒子2、盖盂1、盂1、执壶1、碗1、小钵1、宽沿盆1、盏托2、花口盏1、渣斗1、四系罐2、长颈罐1件，共计46件	素面，瓜棱罐、花口碗与盏作瓜棱腹。除长颈罐与2件四系罐外，其余均为秘色瓷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6—194页。

② 前揭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第186—194页。

③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 前揭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第186—194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安青柯五代墓葬发掘报告》，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晚唐钱宽夫妇墓》“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18—127页。

⑥ 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18—219页。

⑦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第52—60页。

⑧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第46—53页。

⑨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三台山五代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第1045—1048页。

⑩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考古》1975年第8期，第66—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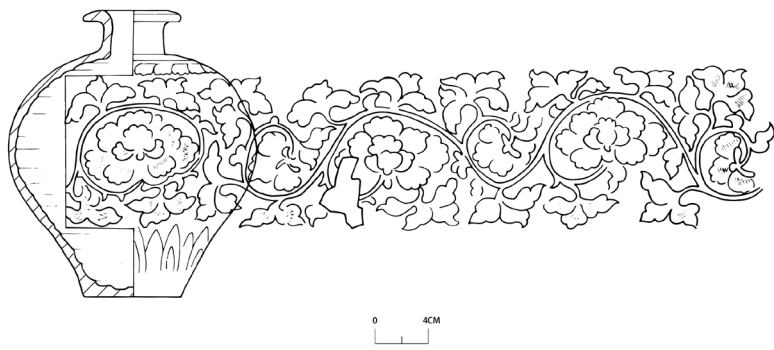
⑪ 前揭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第186—194页。

⑫ 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2期，第37—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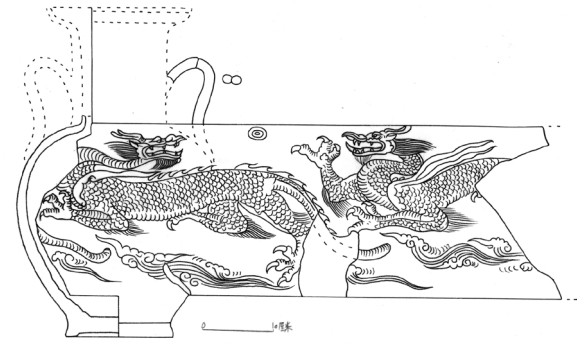
(续表一)

5	五代吴越国钱元瓘墓	942	盘口壶1、执壶1、套盒4、花口碗1、盖3件	素面为主，盘口壶有浅浮雕龙纹、执壶与1件盖面细线划花卉，1件盖，作风首形。均为秘色瓷
6	辽耶律羽之墓	942	夹耳罐与花口碗、斗笠碗各1件	素面，碗作花口、瓜棱腹。碗接近于秘色瓷
7	五代袁从章墓	946	碗1、罐1件，其余不详	素面
8	五代吴越国吴汉月墓	952	盘口壶残片1、执壶1、盖1件	盘口壶残片细线划云纹、盖细线划花卉纹，执壶为瓜棱腹。均为秘色瓷
9	辽赵德钧墓	958	碗1件	近浅浮雕的双层莲瓣纹

〔图四〕吕大临墓出土鼓腹瓶



〔图五〕钱元瓘墓出土盘口壶



钱元瓘墓被盗毁非常严重，但残存的越窑青瓷器仍旧是胎釉质量最高、装饰最为复杂者。

盘口壶1件，颈和口部缺，圆肩，深弧腹斜收，矮圈足外撇。肩部残存对称泥条双复系。肩腹部满饰祥云中戏珠双龙，装饰技法为浅浮雕，纹饰圆滑光洁，线条遒劲有力，图案繁缛，层次分明，刻划清晰。出土时龙身残附着三小片涂金。为浅灰近白色胎，胎质极细腻紧致，胎体打磨光洁，基本不见拉坯所留下的轮旋痕。天青釉色，釉面莹润，有失透的玉质感。是秘色瓷中的精品。残高37.2厘米、底径14.3厘米〔图五〕。

执壶1件，喇叭形大敞口，细长颈，深圆球形腹，圈足较高并外撇。肩部有长弧形流，另外一附双泥条曲柄，上端有圆形小孔，作系盖用。腹部细线划花，共四组草叶纹，线条略粗而流畅，构图端庄。秘色瓷，天青色釉。残高17.5厘米、底径8.3厘米〔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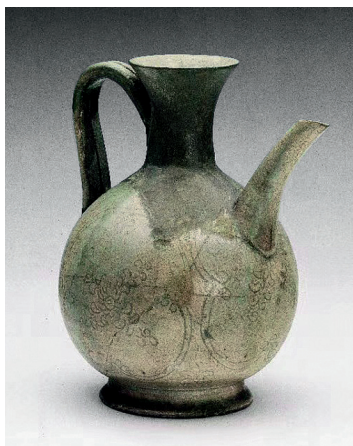
套盒4件，大小形状基本一致，倭角方形，四方形直壁作须弥座式，每面中间作壶门形。秘色瓷，灰白色极细腻胎，天青色釉。口径11.3厘米、底径13.8厘米、高9.1厘米〔图七〕。

凤首形盖1件，圆雕凤首，子口作圆柱形，尾部有小孔。秘色瓷〔图八：1〕。

夹耳罐盖1件，盖面微鼓，直腹，口缘有榫钮二个，钮中有孔。秘色瓷〔图八：2〕。

覆盆形盖1件，宽沿，近圆球形盖面，宝珠形纽。盖面与宽沿上有细线划草叶纹。青黄色釉〔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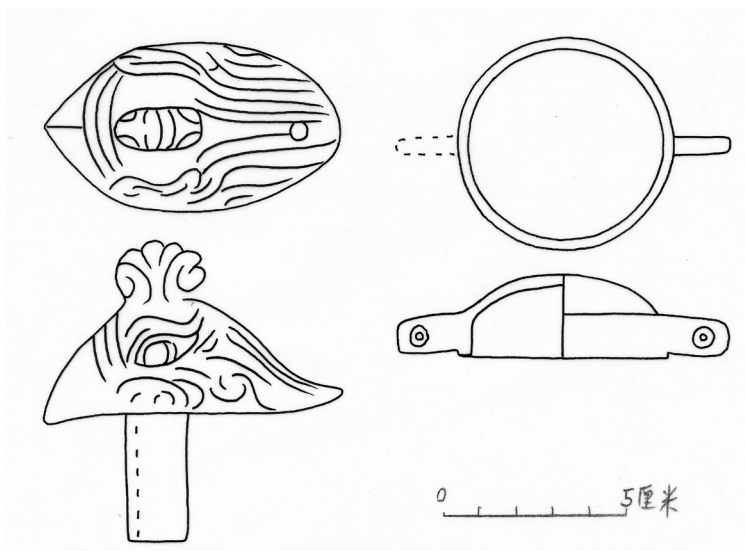
〔图六〕钱元瓘墓出土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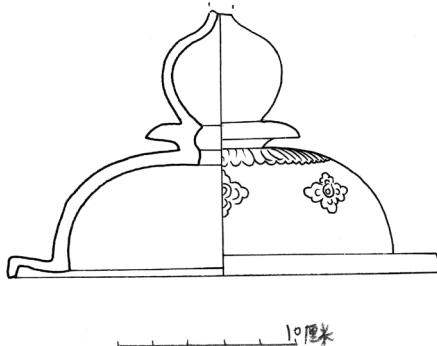
〔图七〕钱元瓘墓出土套盒



〔图八〕钱元瓘墓出土凤首盖与夹耳盖



〔图九〕钱元瓘墓出土覆钵形盖



〔图十〕钱元瓘墓出土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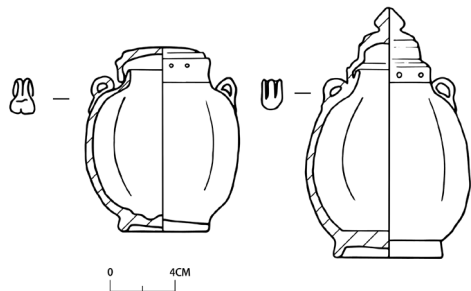


碗1件，敞口，弧腹斜收，平底，矮圈足较直，足壁较厚。内底与足端有泥点痕。浅青色釉，接近于秘色瓷〔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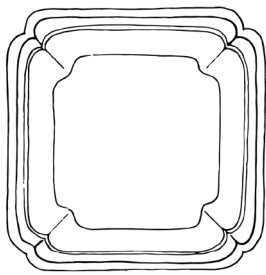
康陵以秘色瓷占绝大多数，除少量的花口与瓜棱腹及简单细弦纹外，均为素面，胎釉质量亦不如钱元瓘墓以浅浮雕龙纹、贴金盘口壶为代表的秘色瓷器。

瓜棱罐10件，造型基本一致，大小略有不同。子母口，深弧腹，平底，矮圈足外撇。肩部用双泥条堆贴一对基本对称的小耳，腹作四瓜棱状。盖有两种：一种是直壁、盖面微弧；另外一种为宝塔形，宝珠钮。素面。通高在10.3厘米-15.6厘米之间〔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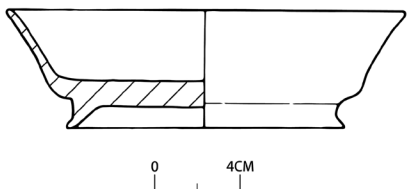
〔图十一〕康陵出土瓜棱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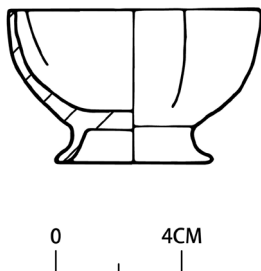
〔图十三〕康陵出土套盒



〔图十二〕康陵出土圈足盘



〔图十四〕康陵出土碗



圈足盘9件，器形大小基本一致，敞口，浅坦腹，大平底，矮圈足外撇。素面。口径12.5厘米、足径8.8厘米、器高3.6厘米左右〔图十二〕。

套盒9件，大小形状基本一致，倭角方形，四方形直壁作须弥座式，每面中间一道粗凹弦纹分成上下两层，下层有两个心形浅浮雕壶门，之间以心形浅浮雕纹间隔。口径14厘米、足径14.2厘米、通高6.8厘米左右〔图十三〕。

葵口碗3件，口微敞，深腹弧收，内底平缓，圈足外撇。六瓣花口及瓜棱腹。素面。M25:采17，口径14.4厘米、足径7.6厘米、高7厘米〔图十四〕。

盏托2件，1件近盘形(M25:采16)，折腹浅坦，大平底，矮圈足外撇。沿面饰有两道细弦纹，内底有一道相对略粗的弦纹。素面。口径12.2厘米、足径6.6厘米、高2.8厘米〔图十五〕；另外1件(M25:采82)，由托座、托盘、高圈足三部分组成，托座与高圈足近上下对称，为杯形，高约3.6厘米。托盘敞口微内卷，浅弧腹。口径7.6厘米、足径6.9厘米、高6.7厘米〔图十六：1〕。

花口盏1件(M25:采87)，近直口，深弧腹，高圈足外撇。器形小巧玲珑。花口凹痕直通下腹部呈弧棱腹形。口径8厘米、足径5厘米、高4.8厘米〔图十六：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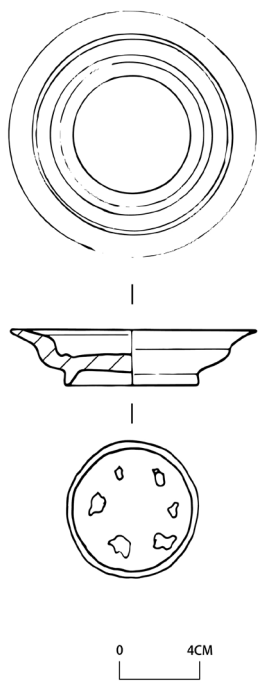
水盂2件，器形与大小基本相同。弧敛口，圆鼓腹，矮圈足外撇。素面。(M25:采27)带子口盖，瓜蒂形钮。口径3.4厘米、底径4.8厘米、通高5.7厘米〔图十七，图十八〕。

盒子2件。子母口，浅扁圆形，平底，盖面较平。盖面边缘饰细凹弦纹一道〔图十九〕。M25:采13口径8.3厘米、底径5.8厘米、通高3.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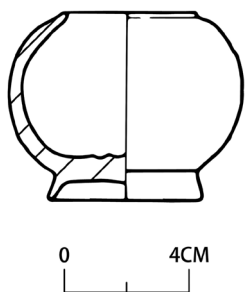
斗笠碗1件(M25：采15)，敞口，斜弧腹，矮圈足。素面。口径12.4厘米、足径5.5厘米、高4.6厘米。

钵1件(M25：采85)，敛口，斜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2.2厘米、足径4.6厘米、高4.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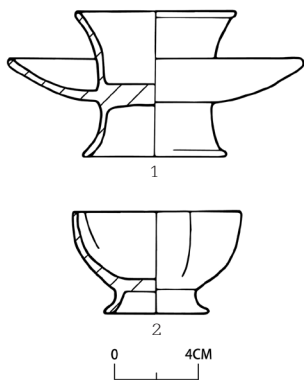
〔图十五〕康陵出土盂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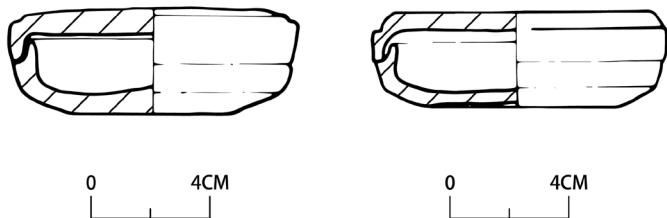
〔图十八〕康陵出土水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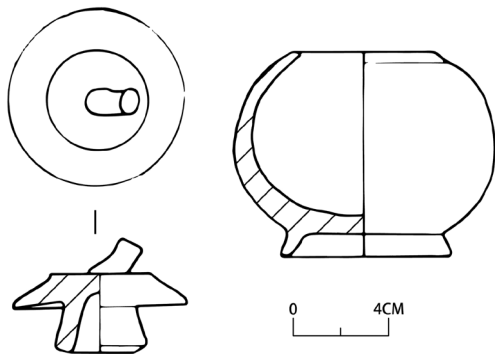
〔图十六〕康陵出土盂托与盂



〔图十九〕康陵出土盒子



〔图十七〕康陵出土水盂和盖



盆1件(M25：采12)，平折沿较宽，敞口，深弧腹，平底微内凹。素面。口径20.9厘米、底径7.6厘米、高6.8厘米〔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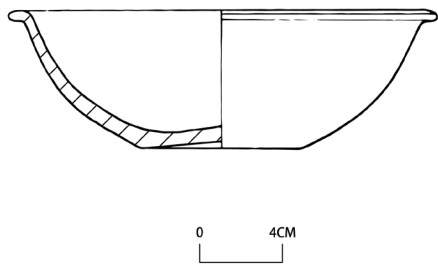
执壶1件(M25：采14)，直口，长直颈，圆球形腹，平底，矮圈足外撇。肩部有长弧多棱形管状流，与流相对的一侧有双泥条柄。盖(M25：12)作子口、浅弧盖面，小圆钮。口径4.4厘米、足径7.6厘米、通高11.4厘米〔图二十一〕。

渣斗1件(M25：采72)，大盘口，束颈，圆球形腹，矮圈足。素面。口径16.8厘米、腹径10厘米、足径6.6厘米、高9.8厘米〔图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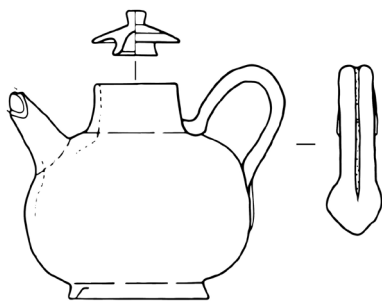
2件四系罐与1件长颈罐胎釉质量均较粗〔图二十三，图二十四〕，与同出秘色瓷存在巨大差异。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基本特征：从胎釉质量上来看，分成秘色瓷与普通青瓷两种，秘色瓷主要出土与高等级的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而一般的官吏与平民墓葬则随葬普通青瓷，如临安童府君墓与宁波袁从章墓，以袁从章墓等级最低，出土青瓷质量最差，碗内底有叠烧痕迹，罐则为青黄色粗瓷。从装饰工艺看，无论是秘色瓷还是普通青瓷器，均以素面为主，少纹饰装饰。仅在最高等级墓葬出土的少量秘色瓷上有纹饰装饰，技法包括浅浮雕与细线划花，题材包括龙纹以及花叶纹；浅浮雕图案则较圆润，整体高于器物腹部，非粗刻较宽而仅纹饰周边减地，图案与腹部并无粗刻的凹痕。在五代末期，越窑青瓷开始出现粗刻花技法，题材为莲瓣纹，线条粗深并减地，主体纹饰略呈浅浮雕状，线条遒劲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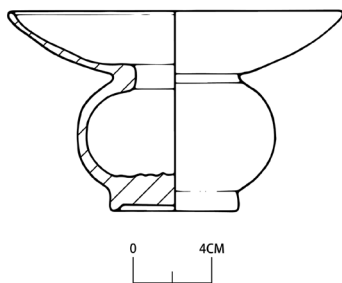
〔图二十〕康陵出土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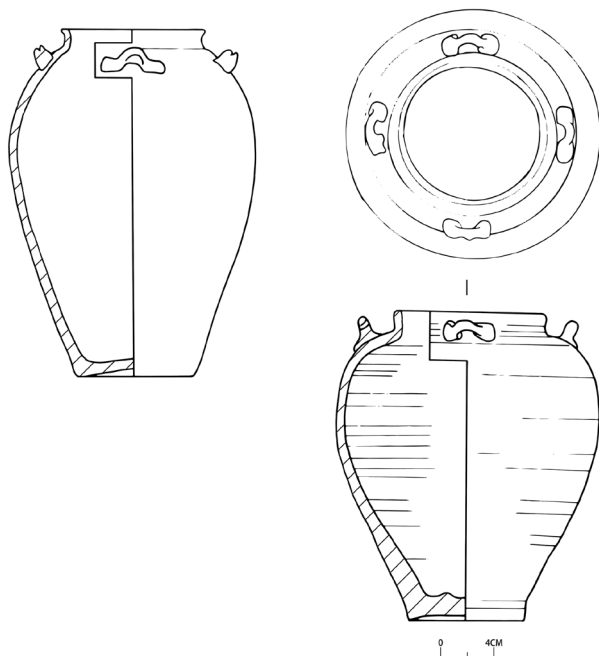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康陵出土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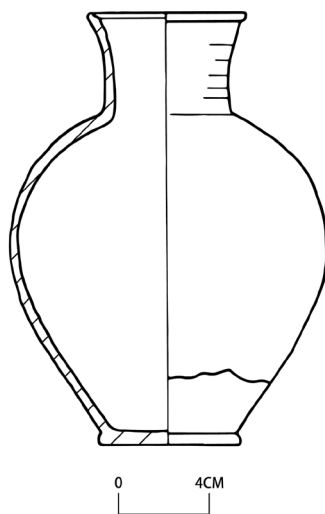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康陵出土渣斗



〔图二十三〕康陵出土粗瓷罐1件



〔图二十四〕康陵出土粗瓷罐



构图端庄严谨。

（二）北宋早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 （960—1022）

北宋早期越窑青瓷主要的纪年材料有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耶律李胡夫妇墓^{〔1〕}、萧贵妃墓^{〔2〕}、韩佚夫妇墓^{〔3〕}、陈国公主夫妇墓^{〔4〕}、韩匡嗣夫妇墓^{〔5〕}、北宋虎丘云岩寺塔^{〔6〕}、黄岩灵石寺塔^{〔7〕}、元德李后陵^{〔8〕}、周王赵祐墓^{〔9〕}等。此外还有多件带纪年款的瓷器：上林湖越窑窑址上采集或出土带有“太平戊寅”（太平兴国三年，978）款瓷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第10期，第3—23页。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10期，第55—80页。

〔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61—381页。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第19—42页。

〔6〕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1957年第11期，第38—45页；两件碗详细信息由苏州博物馆程义先生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7〕 台州地区文管会等《浙江黄岩灵石寺塔文物清理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242—283页；盒子详细信息及照片由黄岩博物馆林杰先生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1—324页。

〔9〕 前揭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第245页。

器多件^{〔1〕}、“咸平六年”(1003)款盘口壶^{〔2〕}等。其基本特征见〔表二〕。

〔表二〕 北宋早期纪年墓与塔基出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

编号	墓葬	年代	出土器物	装饰特征
1	辽耶律李胡夫妇墓	960	执壶2、盆2、碗1件	2件执壶作瓜棱腹，2件盆内腹细线划花，一件龙纹、一件凤纹。秘色瓷
2	北宋虎丘云岩寺塔	961	炉1件、斗笠碗2件	炉近浅浮雕多层莲瓣纹，秘色瓷；碗为素面普通青瓷，生烧剥釉严重
3	北宋太平戊寅款瓷器	978	寺龙口窑址出土碗与盘各1件，上林湖采集碗1、盘2件，古银锭湖采集碗与盘各1件，后司岙出土多件(资料等已发表)	基本为素面，1件盘内底有细线划花对蝶纹、1件盘内有荷叶龟心纹。釉色多接近于秘色瓷
4	辽萧氏贵妃墓	993	碗1、釜1、盆1、钵1、执壶1、盏托2件	流行细线划花，盆内底与下腹划摩羯纹，钵内底与下腹划凤纹、外腹浅浮雕多层莲瓣纹，执壶与1件盏托宽沿上划缠枝花；碗作花口、瓜棱腹。秘色瓷
5	韩匡嗣夫妇墓	993	碗1件	细线划花
6	辽韩佚夫妇墓	995、1011	执壶1、温碗1、盏托1、盏1、盘4件	流行细线划花，执壶瓜棱腹，并划人物、祥云、山石、缠枝花等，温碗、盏与盏托花口瓜棱腹，盏托宽沿上划花卉，温碗内底划鹦鹉一对，盘子为素面。秘色瓷
7	北宋灵石寺塔	998	薰炉1、盒子1件	炉盖镂空并填以细经络纹，炉身为粗刻近浅浮雕莲瓣纹。盒子釉色泛黄，细线划花为较乱花卉。釉色与纹饰均不见于上林湖，当为越窑系青瓷。炉为秘色瓷
8	北宋元德李后陵	1000	盆与碗各1件、套盒1套	均有细线划花，题材为花卉、龙纹与禽鸟等
9	北宋咸平六年盘口壶	1003	1件	素面
10	北宋赵祐墓	1006	碗与盏托各1件	均细线划花，缠枝花卉
11	辽陈国公主夫妇墓	1018	盘4件	均细线划花，2件为缠枝花、1件底吉字款，2件对蝶、1件底官字款

以萧贵妃墓出土数量多而典型。

青瓷碗1件(M2：18)，敞口，深弧略弧斜，平底，口圈足略外撇。花口，瓜棱腹，口径9.8厘米、足径5厘米、高5厘米〔图二十五〕。

青瓷釜1件(M2：7—1)，盘口，深弧腹，平底，盘口上有立耳一对。素面，带扁平银盖。口径17.6厘米、底径6.8厘米、高9.6厘米〔图二十六〕。

青瓷钵1件(M2：8)，微敛口，深腹弧收，平底略内凹。细弦纹两道，弦纹之间填以细线划的花卉纹；内底部细线划花对凤纹；外壁浅浮雕三重仰莲纹。口沿处金属釭痕迹。口径21厘米、底径9.6厘米、高7.5厘米。小钵一件(M2：20)，直口，弧腹，圆底。外壁模印柳斗纹。口径4.6厘米、底径1.8厘米、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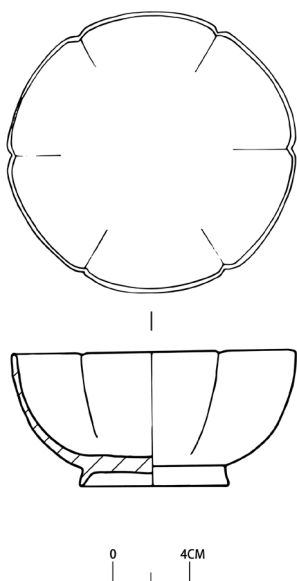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6、101页；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8、72、138、141页；2014—2018上林湖越窑五年考古工作规划项目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掘出土材料；另外根据陈克伦《宋代越窑编年的考古学考察——兼论寺龙口窑址的分期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辑)，见于著录、收藏于各大博物馆带有“太平戊寅”款瓷器有：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釉双鹤纹盖盒、青釉葫芦形带盖执壶和青釉刻花莲瓣纹盘口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釉执壶和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刻花蔓草纹洗，这几件器物流转经历复杂，来源不明，部分器物有明显拼装痕迹，因此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2〕 沈作霖《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罍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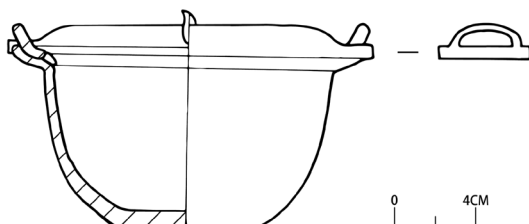
2.5厘米〔图二十七〕。

〔图二十五〕萧贵妇墓出土花口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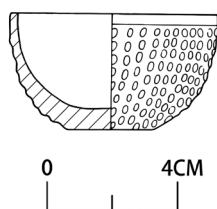
青瓷盆1件(M2:6),敞口,宽折沿,浅弧腹,平底微凹。内壁近口沿处饰两道弦纹,弦纹间细线划折枝蔓草纹。内底部细线划两摩羯纹,首尾相衔,中部有一珠。口径29.7厘米、底径12厘米、高9.4厘米〔图二十八〕。



〔图二十六〕萧贵妇墓出土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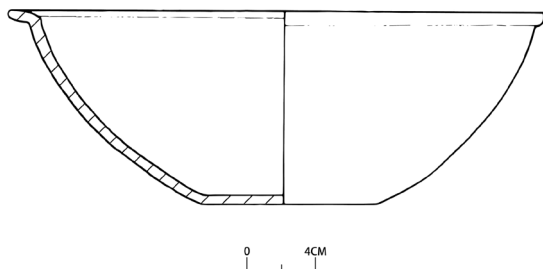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七〕萧贵妇墓出土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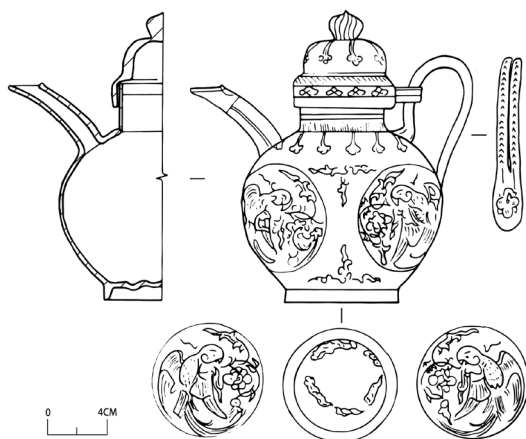
执壶1件(M2:3),直口,长颈,圆肩,深弧腹斜收,矮圈足;肩部有长弧流;相对一侧有曲柄。母口盖,口沿较直,盖面隆起,宝珠形钮。繁缛的细线划花装饰:壶身颈部饰草叶纹,肩部饰流云纹;腹部为开光式四组衔枝鹦鹉纹,云纹相间;盖与流上有缠枝花。流口、盖口加银釦。口径5.6厘米、圈足径7.5厘米、通高18.8厘米〔图二十九〕。

〔图二十八〕萧贵妇墓出土盆



盏托2件,1件(M2:23)敞口浅弧腹,中心托柱呈弧腹杯形,高圈足。花口,细线划折枝花草纹。托柱口、器口、与圈足均带扣。托柱口径8.2厘米、托盘口径16.8厘米、圈足径7.4厘米、高7.2厘米〔图三十〕。另外1件(M2:24)宽沿,浅折腹,中心托柱略呈浅圈形,矮圈足。口及圈足带扣。素面。托盘口径15.3厘米、圈足径10.9厘米、高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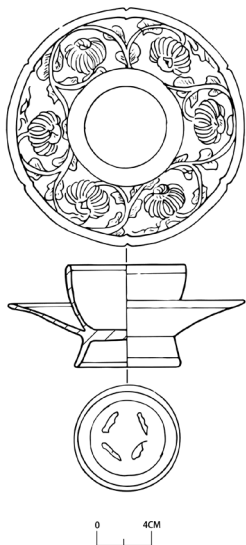
〔图二十九〕萧贵妇墓出土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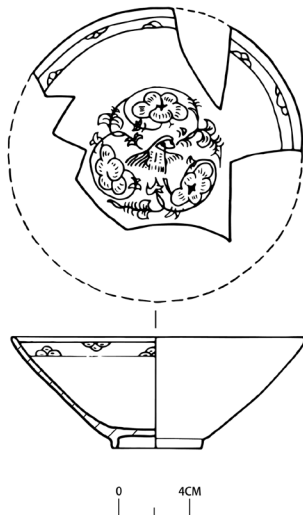
韩匡嗣夫妇墓中出土的碗1件(M3:1),敞口,斜直腹略弧,近圆底,矮圈足较小。碗内细线划花装饰,中心为一展翅鸟,周围有三朵缠枝花,内口沿下有两道细弦纹,弦纹间有细云纹。灰白色胎,青绿色釉。外底圈足内有长泥条垫烧痕。口径16.8厘米、足径5厘米、高6.4厘米〔图三十一〕。该件器物与3件耀州窑雕刻花青瓷共存。

韩佚墓出土的8件器物〔图三十二至图三十五〕、元德李后陵出土的盆与套盒〔图三十六,图三十七〕、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碟〔图三十八〕等器物装饰均为细线划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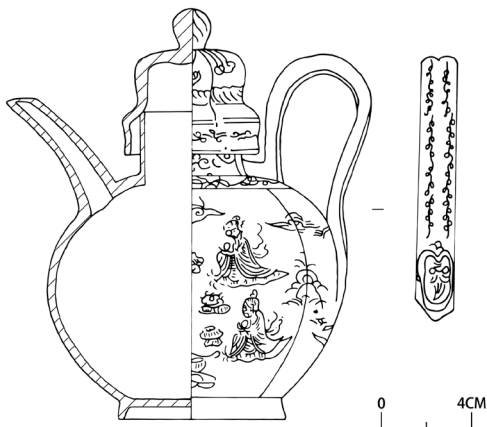
〔图三十〕萧贵妇墓出土盃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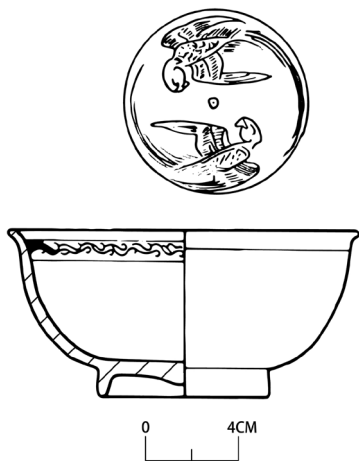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一〕韩国嗣夫妇墓出土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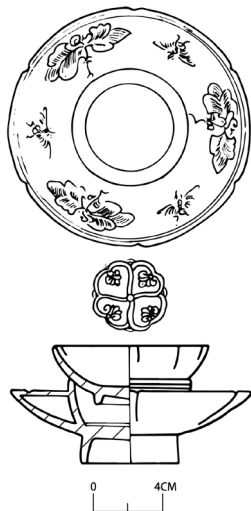
〔图三十二〕韩佚夫妇墓出土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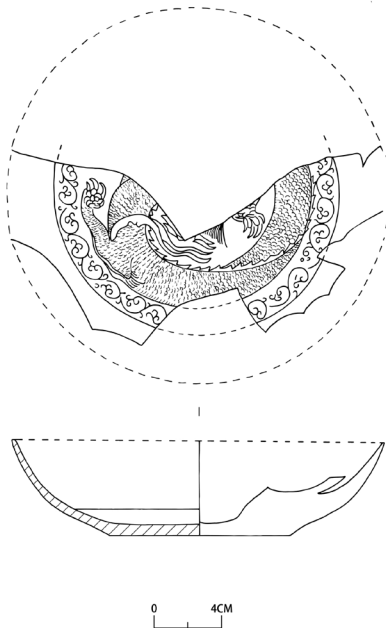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三〕韩佚夫妇墓出土温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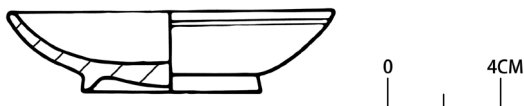
〔图三十四〕韩佚夫妇墓出土盃与盃托



〔图三十六〕元德李后陵出土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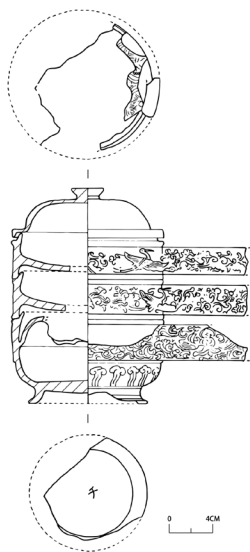
〔图三十五〕韩佚夫妇墓出土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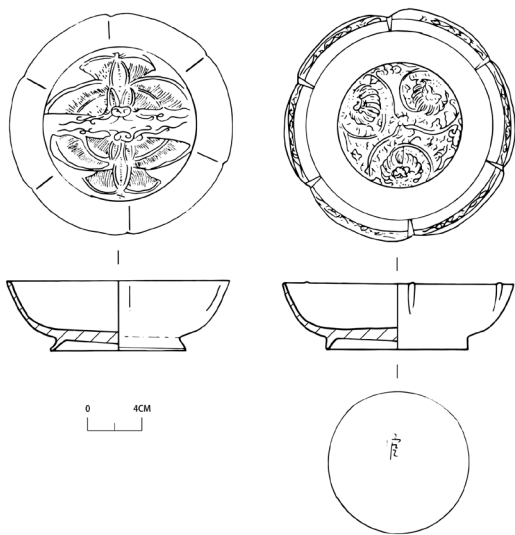
耶律李胡墓出土的执壶均带瓜棱腹〔图三十九，图四十〕，而2件盆分别为细划龙纹与凤纹〔图四十一，图四十二〕。

北宋早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五代以来的花口与瓜棱腹做法得到延续，从耶律李胡夫妇墓的执壶到陈国公主墓的盘子，普遍流行这一装饰方法。五代末期开始出现的浅浮雕莲瓣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苏州虎丘塔和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炉、萧贵妃墓出土的钵，外腹饰以多层莲瓣纹，其中虎丘与萧贵妃墓出土的莲瓣纹略鼓起于器腹，作浅浮雕状，且中心茎略凸起向两侧斜收，立体感强，而灵石寺塔炉的莲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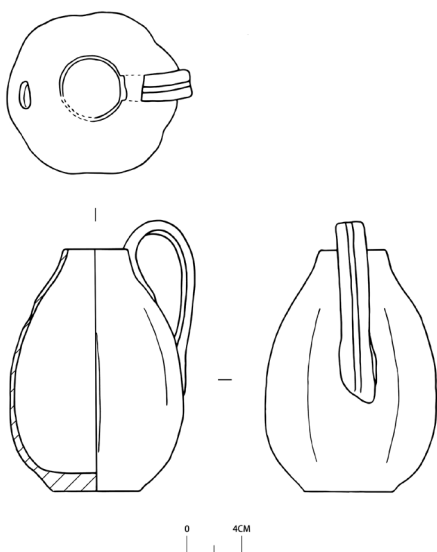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七〕元德李后陵出土套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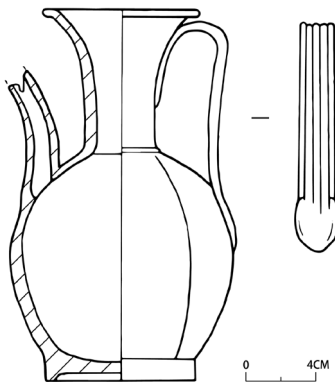
〔图三十八〕陈国公主墓出土磁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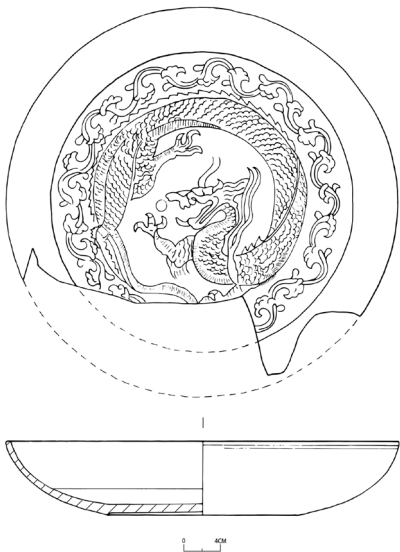
〔图三十九〕耶律李胡墓出土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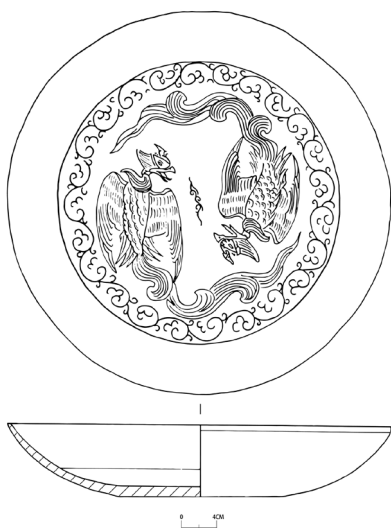
〔图四十〕耶律李胡墓出土执壶



〔图四十一〕耶律李胡墓出土龙纹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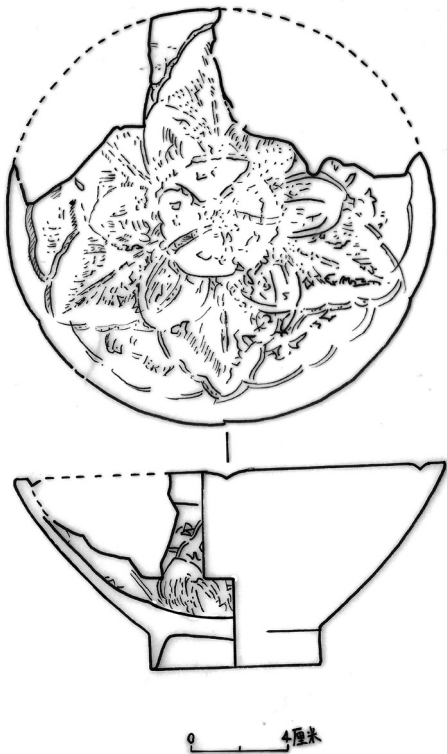


〔图四十二〕耶律李胡墓出土凤纹盆



纹则仅作粗刻轮廓，中心不再凸起，浅浮雕消退，代表了莲瓣纹从早到晚的发展轨迹。灵石寺塔炉盖虽然作镂空透雕装饰，但仍旧结合了粗刻花加细线经络的做法，而这是北宋中期最流行的装饰技法，盖缘有细线划简单花卉，因此这件器物具备北宋早、中期越窑青瓷过渡的特征。这一时期细线划花流行，是最主要的装饰技法，尤其是在高等级、天青色的秘色瓷上，常见有繁缛的纹饰，通体饰于小口类器物如罐、执壶的外腹部，大口类器物如盆、钵、碗与盘等的内腹部、内底等，亦见于外腹部，题材以缠枝花、折枝花、祥云等为主，亦有凤凰、龙纹、鹦鹉、蝴蝶、摩羯等，少量的人物故事。凤凰、鹦鹉、蝴蝶与摩羯等一般成对出现，以首尾相接为主，蝴蝶则为展翅相对。刻划线条纤细流畅，刚劲有力；构图层次分明，主纹与辅纹清晰；布局上除了满饰外，开始出现开光式，这亦是北宋中期主要的布局方式之一。高质量的

〔图四十三〕冯京夫妇墓出土蕉叶纹碗



秘色瓷上亦常见单字款，如陈国公主墓两件盘底的“官”“吉”字款，一般位于外底的正中间，文字纤细，但字体端庄。

（三）北宋中（1023–1085）、晚（1086–1127）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

包括辽耿知新墓^{〔1〕}、宋冯京夫妇墓^{〔2〕}、镇江庆历五年墓^{〔3〕}、虎丘胡献卿墓^{〔4〕}以及“嘉祐八年(1063)”^{〔5〕}和“绍圣五年(1098)”^{〔6〕}款青瓷砚等。其基本特征见〔表三〕。

冯京夫妇墓出土的半笠碗内粗刻蕉叶纹，填以细线篦划纹〔图四十三〕。

北宋中期越窑青瓷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纪年墓数量少、器类单一、纹饰较为简单，不能完全代表北宋中期越窑的基本特征，但多件器上的粗刻花工艺，则是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典型特征。北宋中期越窑青瓷的粗刻花装饰工艺，以粗线条刻出轮廓，再在轮廓线内填以细线划的经络纹，构成了多层级的纹饰图案。无论是粗刻还是细划，线条流畅，构图清晰，层次分明，仍旧保持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北宋晚期目前仅有一件带纪年的砚台，除了文字外，没有任何装饰，无法代表越窑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

〔表三〕 北宋中期纪年墓与塔基出土越窑青瓷基本特征

编号	墓葬	年代	出土器物	装饰特征
1	辽耿知新墓	1026	盘4件	素面
2	宋冯京夫妇墓	1056-1094	碗1件	内腹粗刻蕉叶纹，并填以经络纹
3	宋镇江何家门墓	1045	小盖罐1件，其余不详	盖面与罐身均刻蕉叶纹，叶面中间刻粗茎一道，叶面满填以细经络。刻纹较细
4	虎丘胡献卿墓	1063	盖罐1件、盂1件。其余不详	罐盖面刻花瓣纹，罐身刻蕉叶，叶面中间刻粗茎一道，不填细经络，刻纹较细；盂则作瓜棱腹，肩部有点褐彩装饰

〔1〕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辑，第168—195页。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第4期，第79—92页。
〔3〕 前揭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第248页。
〔4〕 相关材料由苏州博物馆程义先生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5〕 前揭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第249页。
〔6〕 前揭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第249页。

(续表三)

编号	墓葬	年代	出土器物	装饰特征
5	北宋嘉祐八年砚	1063	1件	素面。外壁面有“嘉祐捌年十月二十二日造此砚于东海记”铭文
6	北宋绍圣五年砚	1098	1件	素面。左右两侧各有铭文“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置此砚子水不失者”，另一侧铭“其年米佰价宜”

三 以窑址材料为中心的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发展序列^①

越窑核心地区上林湖的正式大规模考古发掘^②，始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掘了上林湖荷花芯窑址、白洋湖石马弄窑址以及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前两个窑址揭开了晚唐越窑的基本面貌^③，寺龙口窑址则初步建立了晚唐至南宋时期越窑的发展脉络^④。进入2010年以后，以课题为目的，我们重新启动了宁绍平原越窑专题系统调查与勘探，以及上林湖核心区域的有计划发掘工作，先后完成上虞地区近四十处唐宋越窑的全面调查与重点窑址勘探试掘工作，理清了该地区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基本面貌与发展序列，上虞地区是仅次于上林湖的唐宋时期越窑重要分布区，部分窑址产品质量可以与上林湖地区相媲美。而在上林湖核心地区，我们完成了上林湖荷花芯窑址第三至五次发掘，以及后司岙窑址^⑤和古银锭湖张家地窑址^⑥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了唐宋时期越窑的基本面貌，为更详细的分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此为基础，对五代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共可分成如下四期：

第一期为五代时期，包括寺龙口窑址第二期、后司岙窑址TN02W04②、③层，TN03W04②、③层，TN04W04②、③层和TN06W04②、③层^⑦。以碗、盘为主，包括净瓶、盏、盏托、钵、执壶、罐、炉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

这一期整体特征为以素面为主，流行花口与瓜棱腹装饰〔图四十四至图四十七〕，长颈执壶的颈肩交接处、细长圈足盏的圈足近腹处常见有凸细弦纹装饰。

第二期为北宋早期，包括寺龙口窑址第三期，后司岙窑址、上虞傅家岭、窑寺前Y1。器物类型更加

① 为了防止早期叠压地层的扰动性的存在，这里的分期除寺龙口窑址外，基本选择不同时期单独成堆积的地层，以保证包含物的相对纯净性，如后司岙与窑寺前Y1、傅家岭北宋早期的堆积，盘口湾北宋中期的堆积，蒋家山与合助山北宋晚期的堆积。

② 广义上林湖，由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与古银锭湖四个片区构成。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第4—25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慈溪市越窑石马弄窑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0期，第59—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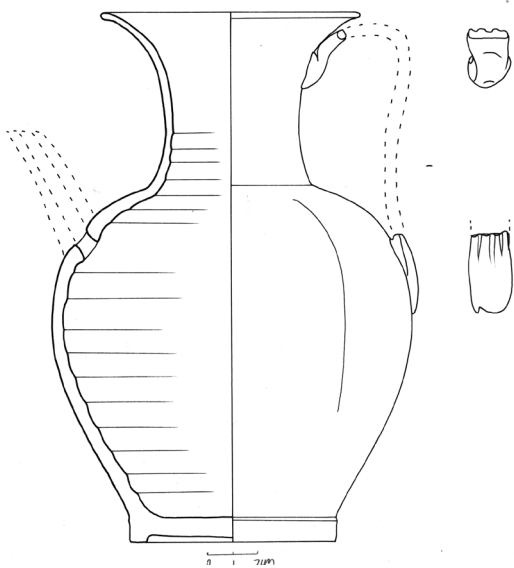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秘色越器》，文物出版社，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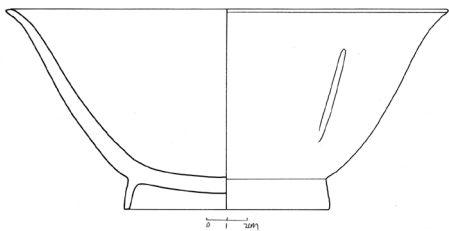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慈溪南宋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19年。

⑦ 前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秘色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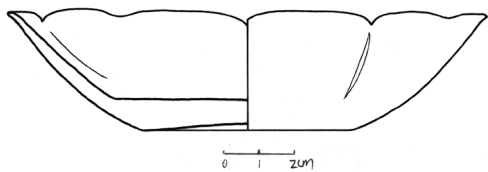
〔图四十四〕五代越窑瓜棱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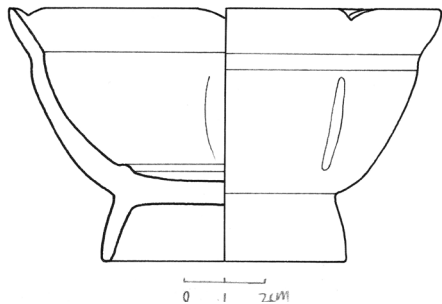
〔图四十五〕五代越窑花口瓜棱腹碗



〔图四十六〕五代越窑花口瓜棱腹盘



〔图四十七〕五代越窑花口瓜棱腹盏



丰富，包括碗、盘、盏、盏托、盆、钵、执壶、炉、罐、盒子等，每种器物有多种不同的造型。

这一时期装饰复杂多样，技法上包括细线划花、浅浮雕以及粗刻近浅浮雕的莲瓣纹等，以细线划花为主，广泛见于这一时期的盘、碗、盆、碟等大口器物的内底与内腹或内外腹，以及执壶、罐等小口器物的外腹部，盒子等带盖类器物的盖面等。题材主要有龙纹〔图四十八〕、凤纹、蝴蝶纹〔图四十九〕、鹦鹉纹、荷鸟纹〔图五十〕、孔雀〔图五十一〕、鸿雁〔图五十二〕、白鹭、龟荷、缠枝花〔图五十三〕、折枝花等。线条细密流畅，构图严谨。浅浮雕的技法上与钱元瓘墓盘口壶上的龙纹接近，但这一时期除了龙纹，新增加了凤纹〔图五十四〕、折枝花等纹饰，器形多为套盒等高质量、高等级的器物。粗刻具浅浮雕效果莲瓣纹数量比较多，通常在碗、盘、炉等器物的外腹部，多层堆叠。这一时期还偶见圆雕器物，在傅家岭窑址发现了1件圆雕龙纹，应该是出香的炉类器物。

第三期为北宋中期，包括寺龙口第四期、上虞盘口湾窑址等。器物种类基本沿袭自北宋早期，新出现五管灯、夹层碗等器物。

该期装饰复杂化，粗刻花工艺流行，细线划花继续广泛存在，通常一件器物上粗刻与细划花纹组合出现，同时开始出现少量的印花、堆塑与镂孔等装饰技法。

细划花主要是各种缠枝花与折枝花，以及海涛纹、禽鸟等纹饰。与北宋早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重点明显转向粗刻花，因此细划花呈衰落的趋势：线条细、浅、弱而不流畅，构图相对草率，出现简化的花卉纹饰。禽鸟昆虫主要是鹦鹉与少量蝴蝶，形象均较北宋早期简化、呆滞，蝴蝶则从正视变成侧视状。

粗刻花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装饰技法，以花卉为主，亦有摩羯、海涛纹等，少量的禽鸟、人物纹。粗刻花不再如北宋早期莲瓣纹作浅浮雕状凸起，而仅是以斜坡状的阴线刻划轮廓线，内填以极细的经络纹，形成主纹与次纹分明的层级构图。花卉题材主要是牡丹、莲瓣、蕉叶以及缠枝花卉等。牡丹作盛开左右对称的团花状，并以开光式布局出现〔图五十五〕。半浮雕莲瓣纹消失，仅粗刻外轮廓，部分填经细经络。蕉叶与莲瓣纹做法基本一致。禽鸟包括孔雀、鹦鹉、鸿雁、仙鹤等，一般作花间飞翔状。花卉装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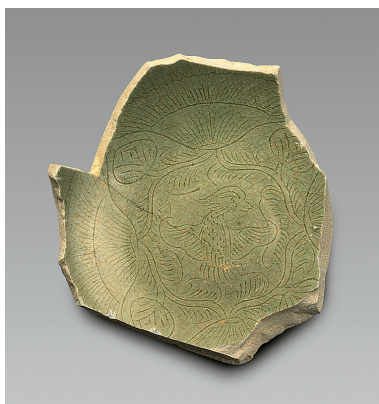
〔图四十八〕北宋早期越窑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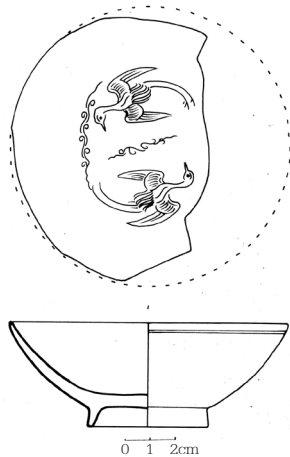
〔图四十九〕北宋早期越窑蝴蝶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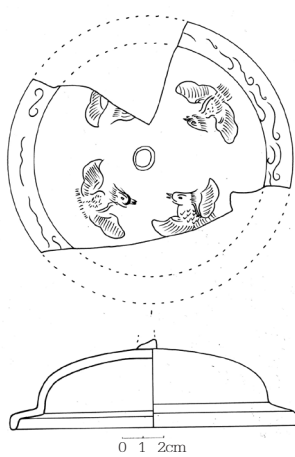
〔图五十〕北宋早期越窑荷鸟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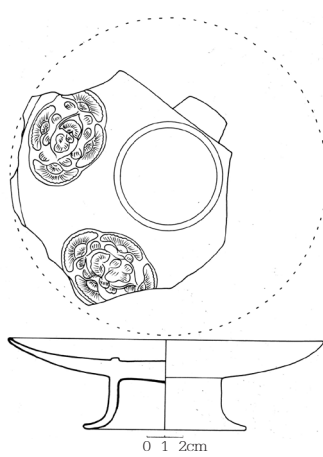
〔图五十一〕北宋早期越窑孔雀纹



〔图五十二〕北宋早期越窑鸿雁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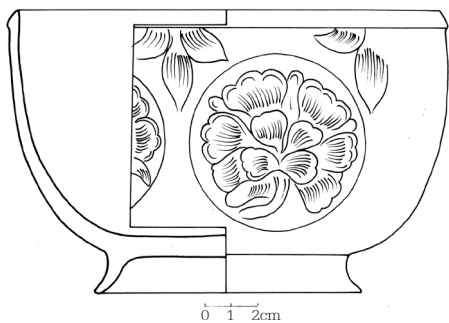
〔图五十三〕北宋早期越窑缠枝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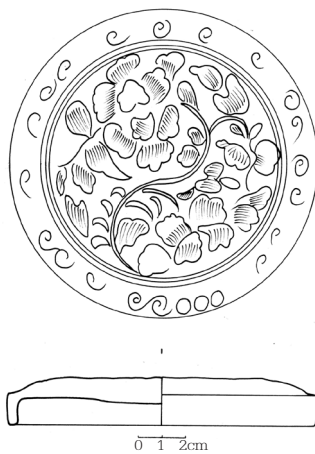
〔图五十四〕北宋早期越窑浅浮雕凤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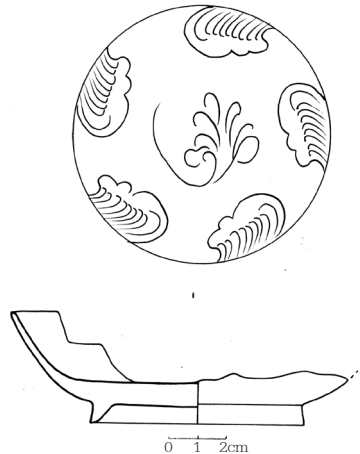
〔图五十五〕北宋中期越窑粗刻牡丹纹



〔图五十六〕北宋中期越窑粗刻缠枝花纹



〔图五十七〕北宋中期越窑细线简化花卉纹



复杂的缠枝与简化的描饰两种，前者除粗刻轮廓再填以细茎络外〔图五十六〕，也有细线划花的，后者则均为细线划花〔图五十七〕。

少量的印花阳纹，多见于盒子盖面、碗与盏的内底等。

〔图五十八〕北宋晚期越窑粗刻凤鸟牡丹纹



〔图五十九〕北宋晚期越窑细线简化花卉纹



疏，粗刻花仅刻划纹饰轮廓，构图杂乱〔图五十八〕。细线划花则更为简化抽象〔图五十九〕。少量的印花、镂孔与堆贴等工艺。

第四期为北宋晚期，包括寺龙口第五期、上虞蒋家山、合助山等窑址。这一期瓷器的器类和风格大体沿袭了前期。新出现了种类丰富的韩瓶。

素面器物比例明显提高，装饰技法沿袭北宋中期，仍旧以粗刻结合细线划花为主，但无论是线条还是构图均更加粗

四 从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演变序列看耀州窑装饰的发展变化

结合纪年墓和窑址两方面的材料，五代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征发展演变如下：

五代时期，以素面为主，常见花口与瓜棱腹装饰，少量的细线划花、浅浮雕与粗刻近浅浮雕的莲瓣纹等。细线划花图案较为简单花卉；浅浮雕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仅见钱元瓘墓盘口壶上的龙纹；粗刻近浅浮雕的莲瓣纹出现时期略晚，接近于五代晚期，数量不多。

北宋早期，流行纹样装饰，题材丰富，构图复杂。细线划花得到空前发展，题材主要为各种花卉与禽鸟，一些高质量的器物上通常装饰繁复复杂的纹饰；浅浮雕的数量仍旧不多，但略有发展，除龙纹还，还有少量的凤纹、花卉等，主要见于套盒等高等级的器物上；粗刻近浅浮雕的莲瓣纹数量有较大的增加，成为仅次于细线划花的纹饰，但在北宋早期晚段凸起的浅浮雕开始变平，逐渐向仅刻划轮廓的方向发展。

北宋中期，粗刻花取代细线划花成为主流，纹饰主要是花卉，少量的禽鸟，摩羯、海涛纹较为流行，以斜刀粗线条勾勒轮廓后再填以经络，形成多层次的复杂构图；装饰细线划花纹饰的器物比例并不低，但很多是与粗刻花组合使用并成为后者的辅助纹饰，作为主体纹饰的细线划花亦更草率、细浅；浅浮雕与粗刻近浅浮雕的莲瓣纹基本消失，莲瓣纹代之以平面粗刻并填以细经络，与莲瓣纹接近的蕉叶纹数量迅速增加；新出现印花但数量不多。

北宋晚期是越窑的衰落时期，素面比例提高，装饰纹饰器物比例下降，技法题材与构图与北宋中期基本一致，但是更加粗率，刻花多数器物仅粗刻简化的轮廓，而不再填以经络纹。印花数量仍旧不多。

以墓葬材料为中心构建的耀州窑青瓷五代到北宋时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五代均为素面，在北宋早期前段开始出现粗刻莲瓣纹，其莲瓣的形状、在器物上的布局等均与越窑自五代晚期开始出现的莲瓣

纹接近。

北宋早期后段，装饰纹样开始较多地出现，有细线划花、粗刻花、雕刻花与小堆贴等，细线划花和粗刻花的技法、构图与题材与越窑接近，小堆贴亦见于越窑“太平戊寅”款盘子内；雕刻花缠枝花卉是这一时期的耀州窑精品，其渊源应该是北宋早期前、后段之间近浅浮雕粗刻莲瓣纹，因此其最终的技术来源仍旧应该是越窑。

北宋中、晚期，伴随着越窑粗刻近浅浮雕莲瓣纹的消失，耀州窑的雕刻花亦开始逐步消亡，而代之以大量的粗刻花与印花纹饰，而越窑的印花工艺一直不发达，题材上大量使用的团菊、轮菊与直条纹等亦不见或少见于越窑，形成区别于越窑的鲜明耀州窑青瓷特色。

因此，北宋中期之前，耀州窑青瓷在包括器形、装饰、装烧等窑业技术上深受越窑影响，北宋早期的装饰题材与技法，均在越窑青瓷中可以找到渊源，包括雕刻花技法与题材在内，都是受越窑技法影响而出现。通过墓葬材料确立的耀州窑青瓷相关装饰技法与题材出现及流行时间，均略晚于越窑，这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其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发展序列与阶段性特征也是可靠的。耀州窑大量装饰的出现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代表其最高发展水平的雕刻花青瓷，流行时间在北宋早期后段，而不可能早至五代时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责任编辑：张 露）